

社会科学与中国社会史研究历程

常建华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天津 300071)

摘要: 20 世纪以来的现代中国社会史研究, 受到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它是伴随“新史学”观念的确立、西方社会科学的输入、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而兴起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50 至 70 年代,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成为惟一的历史理论, 社会史大论战中成长起来的史学家成了历史学界的领导者, 中国的历史研究带有社会形态发展史和社会史大论战的深刻印迹, 同时史学被政治化。这期间社会形态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农民战争史成果可观, 但基本上是诠释理论模式和说明公式化的规律, 生产方式之外的丰富社会生活少见, 诸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难觅, 社会史的研究陷于停滞状况。70 年代末以来, 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的恢复和建设, 中国社会史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盛衰得失, 始终与社会科学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进展, 很大程度上在于源源不断接受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 改变观念, 与时俱进。因此, 坚持与社会科学的对话与结合, 应当是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立场。

关键词: 社会科学; 20 世纪; 中国社会史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 A

20 世纪以来的现代中国社会史研究, 受到社会科学的深刻影响^①。本文拟就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科学与社会史的关系, 社会科学对社会史的影响, 运用社会科学研究社会史的重要成果加以论述。进而为加深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认识提供参考。

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得力于社会科学的传播

中国社会史研究, 是伴随“新史学”观念的确立、西方社会科学的输入、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而兴起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

(一) 西学输入与史学观念的转变

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之作, 是梁启超的《新史学》。1901 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 新史学不是写“一人一家之谱牒”, 而“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 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次年又以《新史学》为题, 批评中国之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十四史非史也, 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知有陈迹而不知有群体”, 号召掀起“史界革命”。他给历史下了新的定义: “历史者, 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 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认为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语言学、群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平准学(即经济学)皆与史学有直接关系。梁启超提倡的新史学, 强调研究国家、群体的进化, 把历史研究的对象从朝廷移向人民群众, 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的观点, 具有打破政治史一统天下, 将人类社会各种活动进行专门化、综合化研究的创新意义。台湾学者王汎森指出: 《新史学》反映出梁氏所重视的是“国家”、“国民”、“群”、“社会”的历史, 这四个词汇在传统中国极少出现, 即使出现, 也不是近代人所了解的意思。这几个“概念工具”塑造了史学革命。

^① 相关的研究可参考常建华: 《20 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 周积明、宋德金主编: 《中国社会史论》,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赵世瑜: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历史研究》2001 年第 6 期。

晚清知识界“最后都隐然认定历史应该是‘民史’，是‘公史’，是‘社会史’，是群体的历史，这对后来的史学发展产生了相当关键的影响。”^①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比较系统地传入中国。严复先后翻译了亚当·斯密《原富》、斯宾塞《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甄克斯《社会通论》、孟德斯鸠《法意》、穆勒《名学》、耶方斯《名学浅说》等，系统介绍了西学，使国人了解到进化论、经济学、社会学、法学、逻辑学等知识。以与社会史关系密切的几门学科为例，西方社会学是清朝末年经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严复等人的积极宣传、提倡逐渐为人所知的，其中尤以 1903 年严复翻译英国早期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在上海的出版影响最大。当时从日本引进西方社会学风行一时，特别是 1911 年欧阳钧编译的《社会学》影响最大。^②民国初年，很多大学都开设了社会学课程。再如民俗学，1918 年北大成立歌谣研究会，创办《歌谣》周刊，发刊词说：“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接着民俗学被介绍到中国。又如人类学，1903 年林纾和魏昌将德国人哈伯兰特（Michael Haberlandt）的英文版《民族学》译为《民种学》在京师大学堂书局出版，同年清政府颁布《大学学制及其学科》，列入了新课程“人种学及人类学”，京师大学堂开设这门课程，定名为“人类学”，陈映璜为这门课程编写了教材，并于 1918 年出版。该书侧重于体质人类学。1926 年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说明民族学主要关心文化。30 年代英、美倡导的社会或文化人类学传入中国，影响颇大，这种新传入的人类学大都附属于社会学。^③西方社会科学的输入与传播，促进了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观念和方法改变，重视研究社会。

西方历史学的输入，也给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注入了活力。1911 年美国学者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也出版了名为《新史学》的著作，批评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病，主张把历史的范围扩大到包括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并且将重点放在日常生活的主要进展方面；历史应该融会广义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用综合的观点解释和分析历史事实；用进化的眼光考察历史变化，把人类历史看成是逐渐发展的过程等。鲁滨逊的这本书在美国影响极大，1924 年何炳松的中译本在国内出版。“此后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各种‘史学概论’一类著作中，都不同程度地吸收或照抄了鲁滨逊《新史学》中的观点。”^④鲁滨逊的学生巴恩斯（Harry Elmer Barnes，旧译班慈）著有《史学》，进一步阐述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该书由向达翻译，于 1930 年在中国出版。巴恩斯的另一著作《新史学与社会科学》也于 1933 年由董之学翻译在华面世。鲁滨逊师弟的“新史学”理论在 1949 年前的中国具有广泛的影响。20 年代法国的先进史学著作也传入中国。1926 年李思纯译朗格诺瓦（Langlois）、瑟诺博思（Seignobos）合著的《史学原论》出版，讲述了历史研究的方法。1930 年张宗文又将瑟诺博思《社会科学史与历史方法》翻译出版，书名中的“社会科学”被界定为统计科学（包括人口统计学、经济生活的科学、经济学说史与经济设计史），该书除重申《史学原论》中的历史方法外，又论述了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作者认为：社会史主要包括人口的历史、经济现象的历史和经济学说史；社会史是社会的历史的一部分，不能与其他的各种专门史分离独立，研究社会史要根据其他历史的研究才能了解，社会史的知识对其他专史的研究也是必须的；社会史不仅要作定性的研究，而且需要作定量的研究；社会史要研究进化的问题；社会现象分为“个人事实”和“集合事实”，二者对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同年是书又有何炳松题为《通

^① 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收入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95-196 页。

^② 参见韩明谟：《中国社会学史》第 23 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③ 参见乔健：《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载《21 世纪》（香港）1995 年 2 月号。

^④ 姜胜利：《〈新史学〉提要》，载刘泽华主编：《近 90 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版，第 88 页。

史新义》的编译本问世。^①如同译本标题中“通史”所示，瑟诺博思的“社会史”强调历史的整体性，是横通的广义社会史，且具有社会经济史的意味。以上法国人的两部书在旧中国也影响很大。有学者指出：“何炳松以社会史的研究作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例子，来阐明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他的《通史新义》不但在探讨方法上独树一帜，而且也揭示历史研究的最新趋势。社会史的研究，就是走向跨学科的一个例子。”^②

社会科学与西方历史学的传入影响了历史学界。民国初年，王国维不但主张文科学习哲学，而且在史学科尝试打破以个别史著作作为某一科目的研习对象，试图通过历史哲学、年代学、比较言语学、比较神话学、社会学、人类学的挹注，重新看待中西史学的课题^③。以北大史学系为例，曾留学日本的朱希祖 1920 年代担任系主任后，主张“以欧美新史学，改革中国旧史学”^④。他认为历史是一种社会科学，必须用科学方法从事研究，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及人种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作为史学的基本科学，规定为必修课。^⑤“我们从北大史学系早期的课程规划中，可以看出现代学院化史学的基本雏形，从理论性科目到通史、断代史、专门史等课程组群，都有相当丰富而完整的呈现，特别是这些学科与基础社会科学、辅助科学之间形成一种典范的作用。”^⑥北大史学的学科性质再向社会科学转化，也反映了中国史学在现代的变化。20 年代以后各大学历史系的课程有明显朝社会科学转化的趋势^⑦。

1925 年李璜在北大开设历史学一课，强调近代欧洲历史学家的历史研究方法留意社会科学对于史学的影响^⑧。李璜又于 1926 年 10 月发表的《史学与社会科学》^⑨一文，较早论述“社会史”。受孔德将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学相当于“社会科学”统称的影响，李璜的“社会史”主要是指用社会科学研究历史。他说：“近三四十年来，因为社会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同时发展，更是彼此影响而关系愈密：一方面社会科学所以渐由哲学的推论趋重到科学的研究，便是因为历史的科学方法之进步，各种社会史，如经济史、法律史等都明确可读，而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法律学便有了依据，一变从前那种理论方式和功利主义的态度，进而为科学的研究……”很明显，社会史如经济史之于经济学，法律史之于法律学一样，是与社会科学对应的学问。不过李璜的社会学不仅仅是指方法论上各学科的总称，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指研究对象，他说：“原来自亚里士多德便知道‘聚成社会的人的研究，不单是许多人的合数的研究’。明白言之，便是许多人既聚成了社会，使这个社会使另有一种性格与力量。而这个新的性格和力量，并不是许多构成分子所原具有的。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对象，便是这种社会性和社会力。”这种社会学可以“使历史家注意到社会的各种特殊状态”，接近于今天理解的社会科学之一的社会学。李璜的社会学既等于社会科学，又指“社会”之学的认识制约着对社会史的理解。

类似李璜的观点还有黄公觉，他在《新史学概要说》第四部分谈《新史学与社会科学

^① 参见乔治忠对《社会科学与历史方法》所作提要，载刘泽华主编：《近 90 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年版，第 43—46 页。

^② 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载罗志田主编：《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633 页。

^③ 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载罗志田主编：《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504 页。

^④ 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收入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会宣传股编：《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第 70 页。

^⑤ 参见傅振伦：《朱希祖传略》，见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 5 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

^⑥ 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载罗志田主编：《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 533 页。

^⑦ 同上书，第 541-544 页，特别是 543 页注④。

^⑧ 同上书，第 531 页。

^⑨ 参见《东方杂志》第对卷，第 20 号；又见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

之关系》^①，是把社会史作为用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而其社会学是指社会科学之一的社会学，自然社会史的含义也是以研究对象区分的。该文讲到地理与史学的关系时说：“地理学与经济史。社会史又有密切关系……社会史与地理有关，因为农业生活是与自然界材料有密切关系。”又在谈历史学与社会学关系时讲：“只有社会学才能给吾人广阔的眼光，对于社会发展的法则，与吾人充分知识；而社会史则在综合社会的进化各阶段，各种社会制度，以及文化的物质方面，所以社会史又有赖于社会学。”他列举社会史的研究事例，有注意民族社会要素的，注意各种制度之互相作用及各个社会阶级之斗争的，企图确立社会发展的法则，发现历史上之重演，确定历史之因果关系的。这种社会史是指社会形态及其发展史。

（二）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及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是促进中国社会史研究展开的重要因素。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讨论始于19世纪末，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于中国。李大钊于1919年第6卷第5、6号《新青年》登载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1920年又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同年他出任北大教授，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其中《史学要论》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大钊在运用唯物史论改造旧中国传统史学上作出了突出贡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奠基者。

五四运动前后，人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社会学。如李大钊1920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一文中指出：“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

所以可把历史和历史学与社会和社会学相对而比论。”他以时间作为历史和社会学的根本区别。这样，历史不过是一种历史的社会学，或者说是社会发展史，这种历史属于社会学的范畴。伴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20年代兴起了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它从总体上探讨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变迁，受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和进化论的影响很深。由于唯物论被视为社会学，自然“社会史的方法”也就被解释为“史的唯物论的方法”。^②

促使全面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契机是中国社会史大论战。1927年国共分裂，国民党清党，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

问题产生了激烈争论。1928年中共六大检讨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托派则认为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是革命的对象。1927年《新生命》在上海创刊，国民党理论家陶希圣著文，认为战国以来中国自古就是士大夫阶级统治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党派由选择中国革命道路引起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进而产生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形成中国社会史的论战。

社会史大论战主要讨论的问题有四个：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阶段、什么是“封建社会”以及中国历史的断限和特征、什么是“商业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社会”。概言之，实际上是中国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的探讨，属于社会形态史、社会发展史^③，用陶希圣1937年为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所作序言中的话说，是“中国史的社会学的解释”。

中国社会史论战对于历史学的贡献，是把“社会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并尝试运

^① 参见《师大历史丛刊》第1卷，第1期，1931年6月；又见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② 参见罗绳武：《民俗学之社会史的研究》，载《礼俗》第1、3期，1931年4月1日、5月1日。

^③ 参见林甘泉等：《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5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社会史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史观是一种宏观的整体史学，美国学者莱文（A. Levine）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意义毕竟不存在于对每个个别事件的解释。它是一种关于历史本身的理论，是关于历史（时代）的结构以及从一种结构到另一种结构运动过程的理论。”^①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研究的出现，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有革命的意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的代表著作，首推郭沫若 1930 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探讨了商周的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开创了先秦社会史研究的新局面。20 世纪 30 年代吕振羽也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 年）、《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 年）。前书是第一部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原始社会的专书；后书首次提出殷商为奴隶社会，西周是初期封建制，秦以后发展为专制主义封建制，该说影响久远。留学法国回国的侯外庐，在 40 年代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3 年）、《中国古代社会史》（1948 年），在亚细亚生产方式、文明路径理论问题上提出了独到见解。上述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吕振羽曾评论社会史大论战，认为：“在中国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来研究历史，严格说来，还只是 1927 年以后的事情。”对中国社会史的重新检讨，引起了对史学研究的一场革命这在史学上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同时在这期间，在考古学，以至人类学、土俗学、语言学等诸方面，也均显示其研究的新动向。“凡此在适应于中国社会史之现实的过程上，在学术史，获得其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在另一方面，作为和现实斗争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之此一时期的史学论争，却未曾达到其可能获得的成绩。”具体原因是“其时史学理论之指导的波克罗夫司基理论的错误，未能发生正确的指导作用”。“参加论战的人们，不但由于史学以至一般社会科学理论素养不够”，而且“分别扮演其在政治上之各自的成见”，结果导致双方“陷于一种空洞的论争”。^②

陶希圣（1899-1988）于 1934 年 12 月创办《食货》杂志，希望以此推动学者搜集社会史料，改变以论代史的政论之争。他在创刊号“编辑的话”中说：“经过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修改，以求“进一步的理论斗争”。《食货》因抗战于 1937 年 7 月停刊，只存在两年半，但该刊发行的一共 61 期中登载了 340 篇论文，如副题“中国社会史专攻”所示，是社会史专刊，所以在中国社会史学术史上意义重大。《食货》所刊论文多属社会经济方面的。陶希圣、鞠清远、杨中一、何兹全、武仙卿、全汉升是在《食货》上发表论文较多的学者，他们探讨了多方面的新问题。其中尤以全汉升的研究最为醒目，全汉升对宋代社会生活的探讨独具慧眼，论述了都市夜生活、城市间影响、食生活、妇女问题等^③。陶希圣除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外，还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师范大学讲授中国社会史课程，培养学生，他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倡导者^④。陶希圣学习

^① [美]莱文：《评科恩的〈历史·劳动和自由——来自马克思的全题〉》，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2 年第 10 期。

^② 参见吕振羽：《史学新论》，载《北平晨报·历史月刊》创刊号，1936 年 10 月 3 日；又见《史学探渊》第 785—789 页。

^③ 全汉升的主要著述有：《宋代都市的夜生活》第 1 卷，第 1 期；《宋代东京对于杭州都市文明的影响》第 2 卷，第 3 期；《宋代女子职业与生计》第 1 卷，第 9 期；《南来杭州的外来食料与食法》第 2 卷，第 3 期。另有《中国行会制度史》（上海新生命书局 1934 年版）一书，系统论述了工商业的行会和会馆。参见吕振羽《史学新论》，载《北平晨报·历史月刊》创刊号，1936 年 10 月 3 日；又见《史学探渊》第 785—789 页。

^④ 受陶学术影响的学生不少，上述所举在《食货》发表论文的学者多是陶在北大的学生（参见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54-55 页）。另外，黄现璠著《唐代社会概略》（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据书前陶希圣 1935 年 9 月的序可知，黄是陶 1931 年在北师大讲中国社会史时的学生，当时黄开始辑录史料，撰写此书。黄现璠还出版《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一书。又如李文治，30 年代中期在北师大历史系读书时，就开始研究农民战争，写了《黄巢暴动的社会背景》，接着在《食货》上发表了关于隋代、宋代农民战争的两篇论文。后来他用四年的时间写下

法学出身，本人的主要研究成果有《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年初版，1935年新生命书局新版）、《婚姻与家族》（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等，有一定的研究深度。

社会史大论战刺激了社会史研究。吕振羽学工科出身，兼治经济史，其转向历史学就是受了社会史大论战的影响。社会史大论战对于当时莘莘学子的影响就更大了，傅衣凌回忆说，他在读大学时，“刚好那时国内正在掀起社会史大论战，我们几个同学对这次论战都十分感兴趣。……尤其对社会发展清形态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最喜谈论，并时和同学邓拓、陈啸江等人交换意见，不久，陈啸江转到中山大学，在朱谦之教授的支持下，创刊《现代史学》杂志，我常给那个刊物投稿，写过一些文章。后来，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我也曾以一个投稿者的身份，投寄文章和译稿。我在学习过程中，深深感到研究历史科学很不容易，以为历史科学不仅需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还必须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①。傅先生所说可以反映那时一代青年学子的治史兴趣和体会。

（三）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风俗、礼俗反映社会的习惯时尚，与民众生活关系密切，最早开展社会史研究的学者，把目光首先投向这里。除了历史学者如张亮采、瞿宣颖（字兑之）、杨树达、尚秉和、柳诒徵、邓子琴等人先后发表的研究成果之外，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国风俗、礼俗的，是得风气之先的文史之外其他领域的学者。研究哲学和比较宗教学出身的江绍原，对中国古代习俗兴趣浓厚，在《发须爪》（开明书店1928年）中，通过分析古人有关头发、胡须、指甲的习俗，揭示其行为背后的精神世界。又在《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一书考察了文献中有关出行鬼怪的记载，以分析汉代以前人们认为旅途中会遇到各种鬼怪的信念。^②江绍原对于民众行为和意识的研究，不仅具有开创性，而且是今天心态史学、历史人类学所追求的。美国留学归来的人类学者李安宅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的礼俗。许地山的《扶箕迷信底研究》（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一书，从笔记中收集了130个古人以扶箕问吉凶福祸，并用箕笔作诗词书画的事例，论述了扶箕的起源、箕仙及其降笔、扶箕的心灵学上的解释。他认为扶箕是占卜术的一种，是一种心理作用的表现。他希望人们能从扶箕反映民族道德行为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角度去体会。

断代社会史研究领域。李玄伯和瞿同祖的先秦研究值得称道。瞿同祖1930年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也上历史方面的课。大学毕业论文《周代封建社会》（《社会学界》第8卷上，1934）就是一篇社会史的论文，1934年他在吴文藻和杨开道两位教授指导下，攻读社会史研究生，两年后毕业。硕士毕业论文《中国封建社会》（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受英国历史学家亨利·梅因（Henry Sumner Maine）和维纳格鲁道夫（Paul Vinogradoff）的影响，注重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与社会阶级的权利义务关系，对“封建”（指传统用法“封邦建国”）社会政治、经济等作结构性研究，以社会学为研究取向。杨开道在序言中称赞该书：“比一班专讲空洞理论，或一班专收零星材料的朋友，自然又高出一筹。瞿君誓以十年二十年之精力，从事于中国过去社会之研究，从此异军突起。”可以说瞿同祖是专业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者。而李玄伯（名宗侗）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1939年版）则以人类学和比较史学为特色，全书第一部分“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序”从社会的家族和政治的邦两个层面研究；第二部分“中国古代图腾制度及政权的逐渐集中”论证中国古代也有过图腾社会，对传统史料的新解释别开生面。社会学者吴景超对汉代人口、家庭、妇女、奴隶、阶

了著名的《晚明民变》（1948年版）一书（参见《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中心线索——李文治先生访谈录》，载《历史教学问题》1997年第3、5期）。李、黄二人是陶在北师大的学生。

^① 傅衣凌：《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载《文史哲》1983年第2期。

^② 参见赵世瑜《江绍原与中国现代民俗学》，载《民俗研究》1998年第1期。

级等进行了研究。^①吴晗是最早注意明代社会的现代学者。1934年吴晗于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后留校，不久即开设了“明代社会”课程，同年吴晗、汤象龙发起成立“史学研究会”，第二年应天津《益世报》之约，承担该刊“史学”版。吴晗的专刊发刊词提出的宗旨认为：“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学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提倡研究下层群众历史的新史学，后来《史学》发表的文章，绝大多数是关于农民和农民战争的。他在西南联大时，又开设了“中国社会史”课。^②吴晗从1934年起发表了系列论文，其研究从阶级关系、社会矛盾入手，重点探讨明代士宦、农民、地主、奴变；元代社会的不平等、投下、匠户、民间宗教结社。特别是40年代他与社会学家对话，从皇权与绅权的关系探讨了社会结构。^③吕思勉的断代史研究体现出社会史的特色。吕著《先秦史》（1941年版）、《秦汉史》（1947年版）、《两晋南北朝史》（1948年版）设有社会组织、社会等级、人民生活、人民生活等专章，并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作出自己的解释。

专门史研究的研究。妇女史的研究开展得早，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版）直到今天仍是相关领域最好的著述。婚姻史的研究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学法律的陈顾远著有《中国古代婚姻史》（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中国婚姻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将婚姻这一社会现象用法律学的框架处理，与传统史学著作的叙述有别。社会学者董家遵是国内最早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婚姻史的学者之一，自1934年起，他发表了有关唐代婚姻、中国古代婚龄、族外婚、收继婚、汉唐离婚、汉唐七出、从汉到宋寡妇再嫁、节烈妇女统计等多篇扎实的学术论文。^④家族、宗族的研究著述较多，陶希圣《婚姻与家族》（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论述了变法及宗法之下的婚姻、妇女及父子，大家族的形成、分解、没落。高达观《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正中书局1947年版）从社会学的视野研究了周、宋、清三个时期的家族，并将古今家族制度作了比较。主修生物学、研习遗传学和优生学的潘光旦，著有《明清两代嘉兴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一书，采用族谱、方志等资料，以图表形式探讨了望族的世系和婚姻，具有遗传学方面的特色。此外，潘光旦早在1922年受“新史学”的影响，用西洋人霍理士性心理学的方法结合中国文献资料写出《冯小青考》的论文，并于1927年由新月书店出版专书，讨论了性心理变态问题^⑤。潘光旦先生还译注霍理士《性心理学》（1941），补充了大量中国两性关系的资料，并写了《中国文献中同性恋举例》^⑥。在上述领域潘先生的研究是开创性的，采取的形式则是西洋理论方法与中国史料的结合^⑦。人口问题已引起学者注意。陈彩章《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是第一部人口通史，已经指出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重要性。还出版了一些华侨史著作，社会学家陈达，写有《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总之，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具有受社会科学影响的特征。新史学强调史

^① 吴景超的主要著述有：《两汉的人口移动与文化》，载《社会学刊》第2卷，第4期，1931年；《两汉多妻的家庭》，载《金陵学报》第1卷，第1期，1931年；《两汉寡妇再嫁之俗》，载《清华学报》第对卷，第9、10期；《西汉的奴隶制度》，载《食货》第2卷，第6期，1935年；《西汉的阶级制度》，载《清华学报》第10卷，第3期，1935年。

^② 参见苏双碧：《吴晗》，见《中国史学家评传》（下），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③ 以上均见《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1986年版。

^④ 今人辑为《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又，董家遵另著有《中国奴隶社会史》，上海社会学会广州分社，1948年版。

^⑤ 初版时名为《小青之分析》，1929年再版改为《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新版收入《潘光旦文集》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⑥ 该文收入霍理士原著、潘光旦译注《性心理学》附录，三联书店，1987年新版。

^⑦ 1949—1951年潘先生又翻译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采取译注方法挖掘大量中国文献资料，证明中国上古时期有过乱婚阶段，见《潘光旦文集》第13卷第197-20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潘先生的这一贡献，由钱杭先生指出。见钱杭《谈“多元视野”》，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期。

学应该借助多学科知识研究人民群众及其体现出的社会共相。有人形象地说，新史学“是与各种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结婚的产物”^①。马克思主义史观是综合 19 世纪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的。史学革命首先是以社会史为突破口的。广义的社会史受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影响，探讨人类社会的演进，以研究社会性质、社会形态为主，是社会发展史；狭义的社会史主要探讨民俗习惯等大众生活，社会分类及其组织、结构。社会史研究的开展首先得益于标志史学观念转变的新史学，体现了新史学的特征。

以研究民众与社会现象为特征的新史学为社会科学提供了用武之地，社会科学学者关心社会史。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法学、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均与群体和生活关系密切，二三十年代接受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最早的一般是留学归国人员，稍后是经过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这些人早期教育一般受中国传统学术训练，熟谙典籍，接受西学后，很容易将新的认识工具在旧学中加以运用，剖析传统社会文化。所以那时的社会科学学者普遍兼通文史，而且有研究历史的兴趣和责任感，做出的成绩也别有天地。以社会学为例，燕京大学早期的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就主张中国社会学应研究中国古代社会。^②事实上，燕大社会学系培养的学者确实在社会史领域大显了身手。如李安宅是燕大毕业后的留校教师。瞿同祖在 1939 年后到昆明，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开设“中国社会史”、“中国法制史”等课程，写出《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 1947 年版）这部法律社会史名著^③，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作品。该书是作为吴文藻主编《社会学丛刊》（甲集）之一出版的。黄华书也是燕大社会学系培养出的学者，研究民俗史，50 年代经常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论文，对中国古代女子化妆、婚俗、节日等有深入的研究。其他社会学者研究社会史的事例，还有吴景超留学归来任教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研究汉代社会史。这些学者受到良好的社会科学和国学训练，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二、学术政治化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停滞

上世纪 50 至 70 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成为惟一的历史理论，社会史大论战中成长起来的史学家成了历史学界的领导者，中国的历史研究带有社会形态发展史和社会史大论战的深刻印迹，同时史学被政治化。这期间社会形态史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农民战争史成果可观，但基本上是诠释理论模式和说明公式化的规律，生产方式之外的丰富社会生活少见，诸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难觅，社会史的研究陷于停滞状况。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停滞原因，首先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封闭性的教条，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并导致历史研究政治化。“在阶级分析中涉及到历史上一些等级、阶级、阶层，这本是社会史的研究内容，但当时理解得不全面。”“人们把精力集中到阶级矛盾采取外部对抗形式方面，而忽略内部形态的一般状况”，主佃的生活状况都不清楚，“其他社会集团的社会史研究更付阙如”。^④历史研究成了政治和单一社会形态理论模式的附庸，社会史研究基本上是宏观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历史哲学层面的政论和实证层面的注释。

在政治的干预下，社会科学各门类不是被取缔，就是被阉割。社会学专业于 1952 年至 1953 年院系调整时取消，1957 年反右取消了社会学；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未能建立起来，相关的内容只在民间文学和民族志中有所体现；文化人类学被民族关系史代替；政治学作为反动学科被取消；经济学只讲政治经济学，再生产过程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被生

^① 黄公觉：《新史学概要》，载《史学探渊》第 1216 页。

^② 参见许仕廉：《中国社会学运动的目标》，载《社会学刊》第 2 卷，第 2 期，1930 年，转引自韩明谟《中国社会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4 页。

^③ 有关瞿同祖先生的生平与学术，可参见王健《瞿同祖与法律社会史研究》，载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附录六，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④ 参见冯尔康等：《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第 1 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 34 页。

产关系三要素代替；法学研究也基本停止。没有社会科学，便没有新史学，学者丧失了理论资源和认识工具，与国外史学界的交流也断绝了，遂使他们由聋变哑，只能盲从。生产方式的社会经济形态史唯我独尊，以至连“社会史”一词也被人们遗忘了。

50-70 年代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是与史学热点连在一起的。50 年代以后历史研究的重心有“五朵金花”之称，即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历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和资本主义萌芽。^①后四个问题均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史有关。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亦称中国古代史分期；二是指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前者的讨论是沿袭社会史大论战，以解决社会形态的演进问题；后者是 50 年代提出的，为通史研究中涉及的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讨论集中在五六十年代，实质在于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性质。农民战争的研究是为了说明历史发展的动力，以揭示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印证中国革命的道路，从 1949 年到 80 年代初累计发表各种文章三千余篇，成书二百种。争论的重大问题是：中国农民战争和农民政权的性质，中国农民战争中的皇权主义与平均主义思想，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 50 年代以前邓拓、傅衣凌等人就有所探讨，至 50 年代中期以后展开热烈讨论，直到 80 年代初期。争论的问题是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代及其定义，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经济部门特别是农业领域有没有的问题，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程度及对阶级关系的影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原因。上述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对中国传统社会形态、性质及其发展的认识，但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旨在诠释理论模式。由于对一些理论的概念认识不统一，标准不同，长期进行理论之争，各取所需史料，为我所用，违反了从搜集资料入手重建历史实态的历史学基本法则。所以尽管出版了许多论著，相对而言，具有高水准的学术著述不是很多。

社会史方面做出的成绩，还是有的。在历史分期方面，王思治《两汉社会性质问题及其他》（三联书店 1980 年版）论证了汉代为奴隶社会，杨生民《汉代社会性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说明了汉代的封建社会性质，汉魏之际封建论的代表人物何兹全所著《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论述了从殷商到魏晋南北朝社会性质的变化，何著、杨著虽然定稿于 80 年代，但主要是总结以前数十年的研究和思考。再以农民战争史为例，发掘了农民运动的大量史料，整理成系列的资料集^②，基本上搞清了历代农民运动的状况，而且由于农民战争史与秘密宗教关系的讨论，推动了秘密社会的研究。^③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促进了对明清社会变迁的认识。有的学者另辟蹊径，如经君健（笔名欧阳凡修）继承瞿同祖的研究方法，从法律人手探讨明清时代的雇工人等级，认为不能将其看成是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自由劳动者，其另具的意义是用法律地位的等级身份考察了社会分类。在土地所有制的讨论中，产生了一些严谨的实证性成果，如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李文治于 60 年代到 80 年代初写成的《明清时代封建土地关系的松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傅在凌作于六七十年代的《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等。这些著作受时代影响，虽不免在观点和内容上或有偏颇，但仍是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史学著作。此外，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提出的很多问题具有启发性，而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 1979 年版）建构了一个中国封建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讨论在三四十年代已经提出，五六十

^① 参见《历史研究》编辑部：《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齐鲁书社，1985 年版。

^② 以 1976 年至 1985 年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料系列汇编为代表。

^③ 如蔡少卿利用档案资料发表了《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1964 年第 1 期；杨讷因考察元末农民战争与白莲教的关系，写了《元代的白莲教》，见《元史论丛》第 2 辑，中华书局，1983 年版。

年代引起讨论,并在 80 年代初又形成了一次高潮。这两者是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的问题,联系之处是东方社会的特点和封建社会长期性的关系,如认为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农村公社长期存在,既是东方的特征之一,也是封建社会长期延缓的重要原因。亚细亚方式和中国封建社会延续问题的讨论是一场理论之争和观点讨论,不过一些学者为剖析中国社会的实证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反映在 80 年代初问世而实际研究是在六七十年代进行的几部著作,如俞伟超《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论先秦两汉的单一(单立人+单)一弹》(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作者受 50 年代有关农村公社讨论的影响,于 1958 年产生了我国古代公社组织本名为“单”的想法并开始收集史料。作者推知商代的“单”应大体是一种家长制的家庭公社,商周之际起,“单”已成为地缘纽带维系为特征的农村公社,两汉时代“单”走向解体,魏晋以后“单”在军队组织和聚落称谓里留下了残痕。柯昌基《中国古代农村公社史》(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一书,依据马克思农村公社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认为中国古代农村大约有三种形式,一是土地国有制基础上的亚细亚公社,二是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家族公社,三是作为封建土地所有附生物的宗法公社。亚细亚公社存在于唐以前,家族公社衰落于宋以后,宗法公社产生于宋代,因此,宋代是三种公社的交叉点。事实上,柯文的家族公社是指累世同居家族,而宗法公社则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宗族。徐扬杰在 1959 年所作研究生毕业论文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村公社和家族制度》,并以此为基础于 1980 年发表了《宋明以来的封建家族制度述论》(《中国社会科学》第 4 期)反映出探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主旨。^①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对于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众多,核心在于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迟滞问题。他提出的“乡族”概念就很有代表性。^②

60 年代为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史学界批判封建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权,以清除封建主义的影响。“四权”的概念由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的确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权力状况。一些学者探讨“四权”问题以认识传统社会,这方面突出表现在“族权”问题上,除了不少批判族权的政论文章外,也有个别开创性的学术论文,代表作是左云鹏的《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历史研究》1964 年第 5、6 期),该文无论是在问题的提出、资料的搜集,还是对宗族发展史的考察,都有创造性。前面提到的傅衣凌、徐扬杰对宗族的研究,也与认识族权有关。80 年代初发表的研究宗族问题的一些论文,也多是整理六七十年代探讨族权成果的产物,如李文治、冯尔康、韩大成、王思治即是。^③与“夫权”相联系的是妇女问题,冯尔康《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述论》一文初稿成于 60 年代,是在认识“夫权”的基础上形成的,80 年代初修改定稿,至今仍是大陆探讨妇女问题为数不多的长篇论文之一。^④

在诠释经典理论和以阶级斗争治史的潮流中,也有个别史学家保持历史主义的治史态度,把占有史料和独立思考视为学术生命,从事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杨宽是先秦史专家,曾受业于吕思勉,历史研究独树一帜。他的《古史新探》(中华书局 1965)对艰深的礼学有精到的研究,发表了冠礼、大蒐礼、乡饮酒礼、飨礼、赞见礼、射礼方面的专论,用现

^① 参见徐扬杰:《宋明家族制度史论》,中华书局,1995 年版,该书是其研究家族制度的主要成果。

^② 参见傅衣凌:《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一个探讨》,载《厦门大学学报》1961 年第 3 期。

^③ 参见李文治:《论明清时代的宗族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 4 辑,1983 年;冯尔康:《论清朝苏南义庄的性质与族权的关系》,载《中华文史论丛》第 3 辑,1980 年;韩大成:《明代的族权与封建专制主义》,载《历史论丛》第 2 期,1981 年;王思治:《宗族制度浅论》,载《清史论丛》第 4 辑,1982 年。

^④ 载于《清史研究集》第 5 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 年版;收入冯尔康:《顾真斋文丛》,中华书局,2003 年版。

代眼光剖析家族制度、农村公社组织等。^①陈直，是以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研究秦汉史的著名学者，尤其注重探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②。治学受到吕思勉影响的唐长孺，其中古史研究深具社会史旨趣。唐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 1955 年版）及《续编》（三联书店 1959 年版）、《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 1983 年版）不生搬硬套阶级矛盾和斗争，从皇权、大族、寒人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把握士族社会，融会贯通，著述多为精品力作。晚年总结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概括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一书。傅衣凌所著《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 1960 年版）探讨了主佃关系的农村社会经济构成和阶级斗争，《明清时代的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考察了私有经济的徽州、洞庭、陕西、福建商人及其资本类型和出路，《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研究了江南社会经济的变化。以上三本论文集之外的论文编入《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主要探讨与资本主义萌芽有关的问题。上述研究虽不免受时代影响局限于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的讨论，但却能提供大量的第一手新资料，并在资料 and 理论之间思考中国社会的特性。

三、社会科学的重建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

20 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的恢复和建设，中国社会史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一）社会科学刺激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

80 年代初，中国学术界开始重新思考社会史研究的问题，试图建立以社会生活、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的新社会史。这种重新思考的大历史背景是改革开放形势下的思想解放，其动力主要来自史学界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对历史理论方法的反思、由于现实生活方式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生活方式理论的探讨、国外社会史理论的传入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重建的三方互动。^③

史学方法论的讨论是改革开放初期引人注目的事情。郭沫若“科学的春天”的说法，形象说明了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实现现代化的渴望，崇尚自然科学成为当时的社会氛围。1980 年，金观涛、刘青峰运用系统论和控制论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与“周期性”问题，提出中国传统社会为“超稳定结构”的结论^④，影响很大。借鉴自然科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三论方法、开展跨学科研究历史的呼吁，一时成为时髦，历史学首次面临自然科学的挑战^⑤。不满教条主义的“史学危机”讨论，正是历史学思考理论方法出路的反映。吴廷嘉也算得上是一位开风气的学者，发表了讨论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论文^⑥，后来吴廷嘉与沈大德所著《黄土板结——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探析》（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探讨小农经济、宗法家族制、专制皇权、礼文化所形成的超强聚合社会机制，是一部有特色的社会史著作。史学方法的讨论，也可以反映在一些笔谈里^⑦。王晴佳认为，新时期跨

^① 杨宽的社会史贡献是多方面的，所著《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和《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1993 年版）均是名作。

^② 陈直：《汉代人民的日常生活》，《西北大学学报》1957 年第 4 期；《汉代戍卒的日常生活》，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汉诗中的习俗语与古器物之联系》，陈直：《文史考古论丛》，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③ 参见拙文《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第一部分，载《历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

^④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80 年第 1、2 期。

^⑤ 程洪：《新史学：来自自然科学的“挑战”》，《晋阳学刊》1986 年第 6 期。

^⑥ 吴廷嘉：《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当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社会科学研究》1983 年第 4 期；《要重视和加强史学方法论的研究》，《历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

^⑦ 如《文史知识》1986 年第 7 期刊载一组“八十年代我们怎样治学”的讨论文章，涉及治学态度、治学

学科史学方法的讨论，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创有密切关系^①。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科学界发生了重要变化，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人口学等学科相继恢复，国外社会科学的著作和动态被大量介绍到国内，开阔了历史学者的理论视野。史学研究者更加认识到吸收当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开展历史研究的必要，尤其是社会学对社会史研究的借鉴作用非常明显。新时期最早系统译介国外社会史学的学者大约是彭卫，同时他也倡导开展社会生活史研究，并从理论和方法上都做了较好的阐述^②。彭卫所著《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就是一部运用新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的著作。彭卫还尝试历史心理学与心态史的研究，宏观之作为《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专门研究体现在《另一个世界：中国历史上变态行为考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蔡少卿先生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翻译了国外社会史研究的众多重要论文。

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的研讨反映了新的问题意识与社会科学的影响。1986年10月在南开大学举行了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就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范畴、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意义进行了热烈讨论，取得了把社会史作为史学专门史或流派对待的共识，强调了借鉴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与方式对开展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性，把研究的视角指向人民大众的生活。^③这届研讨会标志着中国社会史继20世纪二三十年研究风格的复兴。此后，中国社会史研讨会每两年举办一次，目前已进行了九届。1988年10月由南京大学主办第二届，除继续讨论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外，对士与知识分子也进行了重点讨论。^④1990年10月四川大学主办了第三届，讨论的重点是中国宗族、家庭的历史与现实；社会弊端的历史考察。^⑤1992年9月沈阳师院主办了第四届，会议主题是“社会史研究与中国农村”，研讨重点有三：社会结构与农村变迁，历史上的灾变与社会救济，社会史的理论体系、构架与功能。^⑥1994年8月西北大学主办了第五届，会议主题是“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⑦。1996年9月重庆师院主办了第六届，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区域社会比较研究、中国社会传统生活方式研究、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⑧1998年8月由苏州大学主办的第七届研讨会，将“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作为主题。^⑨2000年8月由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第八届研讨会，讨论“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⑩2002

方法、新型研究人才、文史研究的新学科四个方面。

^① 王晴佳：《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专科化与跨学科》第八部分“新时期、新方法、新史学”、第九部分“历史研究的深化及其趋势”，载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下），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5-708页。

^② 彭卫、孟庆顺：《历史学的视野——当代史学方法概述》第4章《多样化的史学视角——社会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该书后记所署日期为1986年11月，第4章为彭卫撰写。类似的内容又见于石谭：《社会史学研究和方法评析》，《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彭卫：《社会史学研究的历程与趋向》，《史学月刊》1987年第5期。又，彭卫：《略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方法》，《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③ 肖骊所作会以综述载《光明日报》1986年12月17日；宋德金的会议述评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该期还刊登了部分会议论文。

^④ 李良玉所作会议综述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会议论文由《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增刊发表。

^⑤ 宋德金、高世瑜所作会议综述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会议论文收入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

^⑥ 岳庆平所作会议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期；会议论文收入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⑦ 周天游、葛承雍所作会议综述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会议论文收入周天游主编《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⑧ 李禹阶、代继华所作会议综述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

^⑨ 唐力行、吴建华、徐茂明所作会议综述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会议论文收入唐力行主编：《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年版。

年8月由上海师范大学主办的第九届研讨会,会议主题是“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②上述研讨会自1994年西安会议起,改为国际会议,加强了同海外学者的交流。此外,1995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台湾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在北戴河联合举办了海峡两岸“传统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③从以上会议讨论的主题就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对于社会史研究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以所谓“新三界”(指1977、1978、1979三年入校的大学生,1985年以后硕士研究生毕业)为主体的中青年学者由于学术背景和成长经历不同,他们更注重社会科学对历史研究带来的影响并付诸实践,强调社会史研究具有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革新意义。《历史研究》编辑部为了总结社会史研究的新认识,于1993年第2期组织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笔谈”,笔谈中陈春声《中国社会史必须重视田野调查》、赵世瑜《社会史研究呼唤理论》、彭卫《时代体验与历史知识的汇合》都指出借鉴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他们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新一代学者的观点。此后发表了一批论述社会史理论的文章,多是从建立学科理论体系出发的,并引起讨论。如王先明反思社会史的研究状况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具有一种使历史学社会学化的趋向,这会从根本上影响社会史研究的正常发展,必须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在总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与失误的基础上推出了一套新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理论框架。^④常宗虎著文《也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理论研究》(《历史教学》1995年第9期)与之商榷,否定王说。《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还发表了常宗虎另一文《社会史浅论》,将社会史研究视为一种方法,并否定中国社会史学科的存在意义。针对常宗虎论文提出的问题,王先明著文反驳^⑤。

1996年以后,面对中国社会史研究进行十年的现实和理论建设,随着学术界在世纪末对各学科进行学术史的清理总结,中国社会史学者也著文进一步探讨本领域的理论问题。常建华在1996年重庆社会史讨论上发表《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征》一文,后《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以《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为题登载。他认为,还历史以血肉的社会生活研究、揭示社会精神面貌的社会文化研究、置社会史于地理空间的区域社会研究是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三大特征。论述了社会史理论的三个讨论问题: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抑或通史;社会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史学科体系建设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并就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谈了自己的看法。周晓虹从社会学者的角度,探讨了这十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科理论问题^⑥。冯尔康在1998年苏州社会史讨论会上发表《拓宽、深化、综合、探索——浅论当前的社会史研究》,认为探索性与开放性是中外社会史研究的两大特征,作为“社会的历史”(整体史)的社会史日益深入人心。为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空泛争论,易于实际操作,他主张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专门史,但是目标是面向整体史^⑦。该文的压缩稿《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收入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认为:“十余年来,关于社会史的概念,即什么是社会史的问题,引起了广泛讨论,观点纷呈,对推进中国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研究水平并未有很大提高,可能

^① 严昌洪、彭南生所作会议综述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会议论文收入严昌洪主编《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唐力行、吴建华、张翔凤所作会议综述载《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会议论文集将由商务印书馆在2004年出版。

^③ 定宜庄所作会议综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11期。

^④ 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兼论历史学的社会学化》,《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

^⑤ 王先明:《中国社会史学的历史命运》,《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又请参见王先明:《关于社会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

^⑥ 周晓虹:《试论社会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

^⑦ 该文的后半部分题为《迈向未来的社会史研究》,收入唐力行主编《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合肥:黄山书社1999

其中就有理论滞后的因素。提出：“我们首先应该把社会史理解为一种新的史学范式，而不是一开始就将其理解为一个学科分支，这才能使我们的社会史研究具有新的面貌，避免‘新瓶装旧酒’和研究庸俗化，同时发挥它在改造整个史学方向方面的积极作用。”^①范式说的提出，促进了人们进一步思考。目前讨论仍在继续进行，如《天津社会科学》的《当代社会史研究走向（笔谈）》（2001年第1期）发表一组有关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笔谈^②，各抒己见，表述有很大差异。再如2002年8月杨念群发起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研讨会，不少论文讨论到社会史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③。

（二）社会史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中国社会史研究应该借鉴各种社会科学，基本上是社会史研究者的广泛共识。学者就此进行的讨论，也表明社会史理论具有的开放性。如岳庆平认为社会史学科整合有学者的整合、课题的整合与知识的整合三种方式，而以知识的整合最为重要^④。赵世瑜强调社会史的整体史观，用了华南社会史研究等具体事例说明社会史与社会科学的关系^⑤。杨念群指出：“一旦我们也把社会结构同样视为一种历史建构过程时，历史的多样与各种鲜活欲现的可能性就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运用多学科手段建立共享的知识前提，进而把社会史领域扩大开放为各个学科都可参与的知识共同体，肯定是一个需要付出长期努力的工作。”^⑥他提出中国社会史研究应当采取“中层理论”，就是受到社会学的影响。在如何借鉴社会科学理论、怎样处理社会史与其他学科关系上，学者存在不同的认识，甚至有些对立。社会史研究者一般主张在坚持历史学本位前提下理解和吸收社会科学及其他学科研究成果^⑦，张佩国则认为以学科本位框定问题意识，不能真正实现社会史学的整合，也不会有开放的问题意识的产生。主张舍弃学科本位观的思维定势，以科际整合的多维视野来推进对问题意识的追索^⑧。而刘志伟重申坚持历史学本位的跨学科对话^⑨。杨念群提出社会科学怎样划定入史限度，如何确立中国历史学的主体性可能，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历史学家必须努力关注的问题。^⑩具体来说，社会史学者讨论较多的是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的关系。

（1）社会史与社会学。在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社会学是最早也最普遍被借鉴的学科。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学最先恢复，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社会史接近，“重建的社会学及其广泛的社会学研究，也是促使社会史研究复兴的一个有力因素。”^⑪中国社会史的倡导者都注意到社会学对于社会史的重大借鉴意义，但对于二者的关系，持有不同的认识。冯尔康认为，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先有理论，按照观点的要求到实践中作调查研究，再归纳

^① 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② 依刊载顺序分别是：冯尔康《关于社会史研究“基本建设”的若干思考》、张国刚《试论社会史研究的学科结构》、常建华《社会史研究的立场与特征》、卞利《社会史研究的典型区域——明清徽州社区解剖》、叶汉民《立足于历史学的社会史概念建构与更新》、孙江《规范、传承与文化霸权》、张瑞德《加强民国时期社会史研究刍议》。

^③ 请参见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会议论文集《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 岳庆平：《社会史研究中的学科整合》，《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4期。

^⑤ 赵世瑜：《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

^⑥ 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30页。

^⑦ 如赵世瑜：《打破学科畛域与历史学的学科本位》，《史学月刊》1997年第6期；刘志伟、陈春声：《历史学本位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中国历史学年鉴1997》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⑧ 张佩国：《社会史学整合论》，《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又见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第一章第二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⑨ 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下册第45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⑩ 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下册第8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⑪ 陆震：《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学科对象诸问题》，《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

到理论,验证自己的理论是否正确。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不同,它要搜集大量资料,加以归纳,得出结论。社会学的研究目的非常明确,它紧紧抓住现实问题,从现实出发,寻找它未来的规律,但是要认识现象,不免要了解它的过去,因而有历史社会学的出现,去完成追述历史的任务。历史学则从历史出发,回到现实,同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正好相反,历史学的社会史、即社会历史学。“历史社会学着眼现实问题,考察的是局部历史现象,它只需要解释被研究的这个问题就可以,而不必统观历史全貌;社会历史学不同,它要把考察的对象放到历史整体中去分析,所以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历史学互相不能取代,要同时并存,并有某些相同的研究对象把它们联系在一起。”^①社会学学者苏驼、王处辉认为,中国社会史是一门通过研究中国历史上具体社会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及其结构,社会问题,社会变迁而总结整合具体的、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的生活秩序的规律的科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与我国社会学的发展是互相促进的作用。即中国社会史研究有助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为社会学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提供便利、加速社会学的研究速度,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发展提供多方面的帮助。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可为中国社会史提供借鉴。中国社会史与中国社会学又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二者的研究内容、目的基本一致,两个学科的有机结合,才是一种全方位的研究中国社会的系统工程。^②

一些学者更认为社会史主要借鉴社会学,甚至把社会史作为社会学在历史学中的应用。石谭认为,社会史学是社会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应用与历史学研究的学科。^③《中国社会通史》总序认为:“本世纪中国两次社会史研究高潮兴起的历史证明,中国社会史有自己独立发展的轨迹。可以说,它是历史学家借鉴以社会学为主体的多学科成果的产物。”^④该书副主编之一朱汉国认为:“社会史作为社会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观察人类历史上的社会。”^⑤乔志强、陈亚平认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深化已显示出对社会学理论和分析模式强烈的依赖性。那些比较成功的新领域、新观点都是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社会学方法的结果。”^⑥把社会史视为历史学和社会学交叉学科的还有戴逸、张研^⑦等。

对社会史全面接受社会学持慎重者也有。常建华在《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中,就社会史学科体系建设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社会史研究不在于套用社会学的理论模式,而在于从中国社会历史事实和过程中总结出与理论的契合点,以建立起中国社会史理论体系。”(第180页)前引赵世瑜《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一文则对于这一问题最有力的论述,在文章的结尾处,他动情地说:“除了社会学的概念和方法之外,社会史拒绝接受其它,于是社会史成了社会学建构其理论体系的资料库及其概念、方法的实验场。这样的前景,想起来就让人不寒而栗。”(第22页)

(2)社会史与人类学。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历史学者特别是社会史学者重视借鉴人类学,或者说开展历史人类学研究。常建华在《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一文中,从新时期社会史研究以社会生活为主的特点出发,针对社会史研究偏重借鉴社会学宏观框架建构的情形,强调人类学对于社会史研究的意义。他说: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不是社会史研究的唯一理

^① 冯尔康:《开展社会史研究》,《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84页。

^② 苏驼、王处辉:《论中国社会史研究与我国社会学事业发展的关系》,《社会学与现代化》1986年第4期。

^③ 石谭:《社会史学研究方法评析》,《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④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⑤ 朱汉国:《关于社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以民国时期的社会史研究为例》,《史学月刊》1998年第3期第83~84页。

^⑥ 乔志强、陈亚平:《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知识体系及其学科地位》,《中国社会史论》第56页。

^⑦ 戴逸:《加强社会史学的研究》、张研:《中国社会特质与社会史学》均载《北京日报》1997年9月7日;戴逸:《加强社会史研究》,《人民政协报》1998年1月19日。

论基础和方法,恐怕也不能说社会史是社会学与历史学结合的产物。“由于社会学理论只是一般原理,而社会历史复杂多变,新时期的社会史又重在探讨民众日常生活,揭示其文化特点,这样社会学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而最适合该类研究的方法,则是社会或文化人类学,以之诠释人们生活及行为中仪式和符号。当然,地理学、计量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对社会史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如果说倡导社会史之初,因为借鉴社会学有利于建立社会史大的研究框架和圈占学术领地,而对其有所强调的话,那么,现在更应该多借鉴以社会或文化人类学为主的多学科研究方法,才有利于研究的深入。”(第180页)

使用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学者,有一种本专业以外的特殊收获。钱杭研究中国宗族形态将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结合起来,他说:“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最大魅力,就是可以使学者获得在书本上根本无法得到的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亲切体验,从而就能够纠正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论偏见,使研究更加符合实际。”^①

一些民族学、人类学者也试图将自己的研究同历史学结合起来。王铭铭就是这样的人类学者,他提倡社区史研究,试图在具体的地方性研究中叙述文化过程的复杂性,其多部著作已引起广泛的关注。所著《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强调以经验性的地方史料为基础来自下而上地重新审视地方史的具体过程,类似社会史的探讨。之后他又出版《逝去的繁荣: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一书,“开拓历史、文化、权力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空间,从而为历史人类学的运用提供一个具体研究的范例。”(第14页)这是一部历史人类学的福建泉州及其附属区域的历史,作者的贡献也主要体现在泉州城市变迁史的研究和历史人类学的尝试这两方面。作者认为,历史人类学,可以是人类学的历史化,也可以是历史学的人类学化。其前提是民族志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结合。这种结合的意义在于指出一些主流的历史决定论自身的历史缺陷,还体现为人类学的文化论与历史学的过程论的协调。“人类学的文化论告诉我们的,不应轻易地强调历史的不连贯性,而应注视文化(即在历史过程中创造出的结构)在历史过程中可能发挥的持续影响;历史学的过程论则告诉我们,尽管文化的最主要特征在于它的持续性,但它在历史中的影响力(即文化成为意识形态支配力量的影响力),是由特定历史时期中特定的权力(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格局所规定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辩证,或过程与文化的辩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历史叙述方法,而且也为我们反思支配意识形态开拓了一条新的途径。”(第418页)毋庸置疑,作者对历史人类学的尝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方法的意义。最近他就人类学是什么样的历史学与什么样的历史学是人类学发表见解,强调理解列维·斯特劳斯的对历史学与人类学结盟的主张^②。宋蜀华就中国西南(云贵高原)民族研究,探索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历史人类学在研究中由于受到历史民族志等资料的局限,往往和考古学以及语言学的研究相结合。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和理解现代有关各民族的族源、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因而它的研究应当着眼于过去而又面向现在和未来。”^③

近年来引进提倡历史人类学的文章开始增多。庄孔韶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趋向介绍了历史人类学。他说:“人类学和历史学之间曾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至少到本世纪中叶仍如此。但实际上,这两个学科在理论、方法论,或研究主题上并非各自截然独立。……现在,‘人类学转向’成了新叙述史的形式之一。其主要特点是促使历史研究关注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事项。这是指历史研究从传统上关注特定政治人物的思想和行动之政治史,转而关心那

^① 钱杭、谢维扬:《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一项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3页。

^② 王铭铭:《“在历史的垃圾箱中”——人类学是什么样的历史学?》,载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 宋蜀华:《论历史人类学与西南民族文化研究——方法论的探索》,《思想战线》1997年第3期第39页。

些普通人的态度与信仰。”^①《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发表一组反映历史人类学的文章^②，特别是2001年7月中山大学举行“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倡导开展历史人类学研究，会议也有专门讨论历史人类学理论的文章^③。

历史学者开展历史人类学的先行者，以华南的学者较早。刘志伟根据自己在与人类学者合作过程的学科对话经验，强调人类学家注意到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形成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历史学家就不得不重新反省对“过程”的结构作历史阐释的角度和方法^④。人类学者黄向春就历史人类学的有关问题访问历史学者郑振满，郑振满认为：“由于学术旨趣的不同，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历史人类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就历史学而言，历史人类学的特征应该是‘从民俗研究历史’。这就是说，我们研究历史首先要从民俗入手，考察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民众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然后把各种民俗现象和宏观历史进程联系起来，揭示民俗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在方法论方面，历史人类学应该同时运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这是因为，历史学擅长对于历史文献的解读和对于历史过程的分析，而人类学擅长对于民俗现象的考察和对于社会文化的分析，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做到‘从民俗研究历史’。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也许可以把历史人类学理解为‘从历史研究民俗’，这似乎是一种相反的研究取向，但在方法论层面，二者又是相通的，也就是说二者都必须同时面对历史和民俗现象，都必须同时运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⑤黄向春更从人类学的角度谈民俗与历史学的人类学化，指出其对于史学转型的深刻意义^⑥。人类学重视社区研究，历史学借鉴社会或文化的人类学，自然会重视田野调查，强调区域或地域的社会史。陈春声倡导运用人类学研究社区历史，他在前引《中国社会史研究必须重视田野调查》中说：“小社区的典型研究对于理解一个社会内部多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向，具有其它研究所不能取代的意义。而在小社区研究中，田野调查（即人类学家所强调的‘参与体验’）的方法就成为最基本的工作方式，如果把社区（在实际工作中，可以是一个自然村，也可以是一片有相近文化特征或社会经济联系的地域）理解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那么通过实地深入观察而获得对社区内部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外部联系的了解，对于深化整个社会史的科学认识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小社区的研究实际上已带有揭示‘整体历史’的意义，而且这种在较深层次上对复杂社会关系的总体把握，也只有在小社区的研究中才有可能。……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倡导小社区研究和田野调查的根本目的，在于社会史理论的本土化。”（第12页）最近，陈春声探讨了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建构的问题，主张在地域社会具体的时空脉络中解析乡村故事^⑦。

1998年有人就区域社会史采访了刘志伟、郑振满、梁洪生、邵鸿四位学者，他们进一步表达了追求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结合的学术关怀。他们从三个方面谈了研究的取向：一是他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底层的、普通大众的历史与生活”，二是把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结合起来，三是研究区域史是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人类的历史。^⑧华南学者以田野工

^① 庄孔韶：《历史人类学的原则》，《中国都市人类学通讯》2000年第3期。

^② 主要有蓝达居：《历史人类学散论》，徐杰舜：《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简论》。

^③ 如张小军：《历史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兼论被史学“抢注”的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一卷第一期，2003年版（香港）；常建华：《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在中国的实践》，《人文论丛》2002年卷，武汉出版社2003年版。

^④ 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又载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⑤ 郑振满、黄向春，《文化、历史与国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五卷，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⑥ 黄向春：《民俗与历史学的人类学化》，《民俗研究》2002年第1期。

^⑦ 陈春声：《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研究的若干问题》，载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⑧ 史克祖：《追求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结合——区域社会史研究学者四人谈》，《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作配合区域社会研究的确是有特色的^①。

(3) 社会史与地理学。社会史与地理学有一定的交叉关系。历史人文地理与社会史关系较为密切,谭其骧倡导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关注人口、产业、交通、聚落、疆域政区、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他认为:“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于此前此后的经济区域和文化区域,恰当地指出各区的地域及其特色,是论述这一时期人文地理的重要内容。经济区域当然是由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形成的,而文化区域的形成因素则主要是语言、信仰、生活习惯、社会风气的异同。全国和各大区域内的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以及人物产地随着时代的推移往往也有所变动。这些都是中国历史文化地理亟待开拓的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②王振忠指出,历史社会地理学以文化环境为研究对象,探讨历史时期各种人群(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比较人文类型及其形成过程具有对中国基层社会实态加强理解的意义^③。地理学与历史学也是学术界关心的问题,《读书》1997年第5期围绕“地理学的人文关怀”发表了一组文章,其中唐晓峰的《社会历史研究的地理视角》强调,地理学有“人地关系”还不够,应加上“人与人”的空间关系,指出现在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已涉及军事地理、文化村落、疾病分布、商帮研究、地图思想、天下观念、地域宗教、风水思想等,希望国内研究社会历史的同行们,能多关注地理问题。赵世瑜从空间观察人文与地理学的人文关怀着重论述了年鉴学派总体史观体现的区域史和生态学问题。近年来不少学者将研究历史地理与社会史结合起来,如王振忠的《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运用徽州地域社会的民间资料进行民俗研究,冯贤亮著《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将江南的生态环境社会问题结合起来研究,都有创意。

(三) 具有社会科学特色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成果

新时期吸收社会科学进行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成果卓著。笔者在前引《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一文中,对1998年以前的众多社会史专著作了介绍,这里主要就此后的新著加以评述。周积明、宋德金主编的《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这部120余万字的大书,凝结了中国社会史学界众多学者的心血,是本领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中国社会史论》分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中国社会史的基本问题、阶段性问题、区域社会史的个案研究四编,集中了所探讨领域的专家,论述具有深度,颇有些《剑桥中国史》的形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了多卷本的《中国风俗通史》,主要论述衣、食、住、行、婚育、丧葬、生产、节日、游艺等方面的社会风俗,也是重要著作。

除了上述社会史的综合研究外,专门的著作也不少。社会习尚与民间意识领域的研究得到了加强。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探讨了佛教流行北方社会的历史背景、造像记所见民众信仰、民众佛教修持方式的特点与佛教信仰的社会影响。两位在德国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出版了专著:简涛《立春风俗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将民族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重点探讨立春的文化变迁;朱青生《将军门神起源研究——论误解与成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则探讨文化哲学问题,认为民间习俗是对现象和人生解释的结果。顾希佳著《祭坛古歌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0)、贾二强著《唐宋民间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也是可注意的著作。吴存存著《明清性爱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主要依据明清小说中的描写,剖析了明清时期正统性爱观与节烈风气、纵欲主义思潮、男性同性恋风气与同性恋文学、金莲崇拜、异装癖风气,论述新颖。庙会的研究有两部新著:赵世瑜著《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从中华帝国晚期时代的民间庙会这一生活空间向外延伸,

^① 可参见张小也《人文学者的工作坊》,《中华读书报》2002年12月28日。

^② 谭其骧《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历史地理》第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③ 王振忠《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复旦学报》1997年第1期。

探索明清社会转型时期的民众生活与大众文化，揭示了庙会这一类游神祭祀活动的基本特征，即它们不仅构成了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也集中体现了特定时节、特定场合的全民狂欢；小田著《在神圣与凡俗之间——江南庙会论考》（人民出版社 2002）则是强调神圣与凡俗“两个世界”的不同，冯尔康先生的序言称赞该书是“跨学科研究的可喜成果”。

地域社会史的研究继续深入。城市社会史方面，刘凤云著《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1）分为城墙，坊巷与社区，官衙与民居，市廛与寺观，剧院、茶馆与会馆，私家园林六章。论述了中国传统城市的政治属性及其特征、中国传统城市的空间模式。乡村社会与村落社区。马新《西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 1997）剖析了两汉乡村社会的内部结构，展现了当时乡村生产、生活的面貌。张佩国著《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 年的山东农村》（齐鲁书社 2000）寻求经济史与社会史的契合，分析范式的转换与研究方法的创新。他还著有《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一书，作者所说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是指中国乡村史的乡土化书写。通过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分析了江南地权，灾荒与地域社会的关系，是比较新的问题。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不仅从宏观的角度对剖析了自然灾害与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且以中国历史上所发生的大量自然灾害个案为切入点，深入细致地探讨了灾害的过程与规律、灾害与人口的关系、灾害中官僚系统与地域社会的作用、水灾与地域社会、灾害与社会风俗等问题。夏明方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 2000）主要以乡村为中轴而展开，涉及乡村的环境、人口、农业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秩序等几个方面，力求揭示民国时期自然灾害发生的状况、成因及其在乡村社会个层面的扩散过程。灾害往往引起瘟疫，探讨瘟疫与地域社会的关系，也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余新忠著《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分清代江南瘟疫的生态社会背景、疫情、对瘟疫的认识、瘟疫成因探析、与社会的互动 5 章，为人们展示了清代江南社会的瘟疫与社会的历史，值得人们参考。

社会组织与群体方面新著不断。具有社会学等多学科眼光，运用清代档案资料研究家庭获得重要突破。反映在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 2000）、王跃生《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0）与《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三部学术专著上。以资料雄厚和定量研究为特色，他们的著作大大改变了清代婚姻家庭研究的薄弱状况。李中清、郭松义、定宜庄编论文集《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立意新，收录中外学者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李卓主编《家族文化与传统文化——中日比较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从家的结构、家的历史、家的伦理、家的传承、家的传统、家的规范、妇女问题等方面进行了中日家庭的比较研究。宗族方面，钱杭著《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认为联宗与联宗组织主要表现了地缘性质，而非血缘。肖唐镖等主编《当代中国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跨学科的研究与对话》（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2），收录了由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农村经济学和文化学学者跨学科讨论农村宗族与乡村治理的论文，显示出学者重视社会史研究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宋军著《清代弘阳教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能够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把宗教结社作为“越轨”亚文化群体研究。妇女史与性别研究的进展突出，杜芳琴《发现妇女的历史》、《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1998）是两部中国妇女史的重要论文集。

跨学科研究还表现在将不同学术领域的专门史打通，进行交叉与边缘性的研究。首先表现在思想与社会方面。引人注目的是杨念群所著《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三联书店 1997），用“话语分析”方法描述儒学传统在区域空间中

的扩散过程，及其对近代知识群体运动的影响。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终极依据，描述了作为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使我们看到思想史还有另外的写法。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从明清之际士大夫的“话题”入手，进行“人与思想”的连接，以揭示士人的心态。刘泽华《中国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从政治理念和社会控制机制探讨了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历史。高翔著《近代的初曙——18 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分为时代与问题、理欲之争与生活方式的变迁、学术观念的多元化趋势、政治观念的变迁、时代精神与社会发展五章。作者认为：“18 世纪中国知识界的社会观念，为我们展现的是一幅蕴含变革的动态的社会场景：笼罩在纲常礼教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正在黯然失色，以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为特色的社会新观念正在盎然兴起。”（611 页）薛君度、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收录了社会变革与国民意识、传统观念与习俗演变、近代化与经济伦理三方面的论文。

其次，国家与社会以及法制社会史近年研究盛行。市民社会理论受人关注，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大出版社 1997）是这一方面的著作。钱粮、刑名是基层社会的两大问题，也有以此为切入点的研究。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7）通过明清时期里甲赋役制度在广东的实行情况，考察了地方政府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动趋势。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是一部法律社会史著作，作者从清代习惯法的渊流、背景、流变到习惯法的性质、形态、功用，以及习惯法与国家的关系、习惯法在社会理论上的意义等，都作了探讨。法律与社会的研究还有赵晓华著《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从讼狱制度看社会或者说将制度史与社会史结合，是本书的特色。张仁善著《礼·法·社会——清代法律转型与社会变迁》（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1）用历史学、法学、社会学等方法，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清代礼法在清前期、中期和末期与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心态等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时期礼法的社会功能，梳理出清代礼法由合一到分离的线索，分析了礼法的演变对传统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影响。

从经济透视社会的著作也值得注意。吴承明著《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 2001）以中国现代化理念为宗旨，收集了有关明清市场及其与社会经济关系的系列论文。认为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是新的经济因素及其运行方式的出现与发展，如果这种新的经济因素大量地、集中地出现，而且其发展趋势不可逆，那么它就是现代化因素。这种新的经济因素，比如引发适合于它的制度上的变革，这样它才能持续发展，否则就会被旧的僵化了的制度所扼杀。而新的经济因素及由此而来的制度变革，必然反映到社会上，引起社会结构、家族制度、等级和群体权利、人们行为和习俗的变迁。经济发展——制度变革——社会变迁，这一系列变化在最终或最高层次上，还要受到民族思想文化的制约。

结 语

综上所述，20 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盛衰得失始终与社会科学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在于源源不断接受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改变观念，与时俱进。因此，坚持与社会科学的对话与结合，应当是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立场。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史与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加强，开展跨学科研究，成绩是突出的。但是也有一些关系需要进一步理清，首先是“适度”问题，如历史学向其他学科的开放上，多数学者主张以历

史学为本位，反对丧失本位的多维开放。在一定程度上，这个问题也可以换种提法，即实证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冯尔康先生在 2002 年中国社会史学会上海年会的演讲中，总结目前的社会史研究现状有以下几个特点：重视跨学科研究；愈来愈多地成为一种思维范式；整体史研究的概念。他提醒说：如果刻意使社会史研究成为“显学”，就会出现各种偏向，因此应该将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以保证社会史研究的规范化和健康发展。冯先生的提醒值得注意。应当说在学科整合问题上，从教学到研究还需要继续探索行之有效的方法。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历程表明，中国社会史研究接受社会科学的影响有如下的发展趋势：一是地域社会的研究受到不断扩大与深入，目前地域史的层次性问题已经引起注意，研究与人类关系密切的疾病、灾害的环境史日益凸显；二是民众意识、信仰的探讨渐成风气，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的比重加强；三是探讨国家与社会、思想与社会、法制与社会这类从某一侧面强化整体历史研究的题目不断增加；四是疾病、医疗社会史这些关注生命以人为本的研究得到开展。

面向未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应当继续提升学术水准、加强国际学术前沿课题的研究、突出中国社会史研究特色。而开展跨学科研究，强化问题意识，仍然是需要努力的重要环节。

收稿日期：2008-12-5

作者简介：常建华（1957 年～），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